

# 宗教事務幹部體系內部對「封聖」的看法

本刊編輯室

本刊頃接一位海外讀者轉來題為《天主教工作學習參考資料》(第一冊)(二零零零年九月)的局部影印本，內裡提及中國政府當局的宗教工作幹部體系對二零零零年中華天主教徒得到教廷列入聖品一事的評論，本刊謹將局部內容摘要登刊，以便讀者了解有關幹部體系在封聖一事的立場。由於該份《參考資料》提及對傳教士歷史問題的看法，本刊同時引述兩位中國資深歷史學家近年對傳教士的評價，以供讀者參考。

《天主教工作學習參考資料》(第一冊)頁二

十三的分題是「梵蒂岡『封聖』活動意在歪曲和篡改歷史，美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其中的主要内容如下：

眾所周知，中國近代史上的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是完全正義的，全世界熱愛和平和主持正義的人們都給予了充分理解和支持。天主教在歷史上曾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利用，充當了侵略中國的工具，一些傳教士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充當外國殖民者的嚮導、翻譯、情報官，參與起草對華不平等條約，並憑借不平等條約中有關不受中

國法律管轄的「治外法權」，販賣鴉片，橫行霸道，欺壓官民，掠奪錢財。他們的罪惡行徑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理所當然地要遭到中國人民的反抗。這些鐵的事實，是任何人、任何時候都無法否認的。

如果「封聖」活動僅作為純粹宗教意義上的活動，其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但梵蒂岡即將「封聖」的都是些甚麼人呢？這些所謂的「聖人」大多數是因違反中國法令被處死，或在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在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中被殺死的。

眾所周知，因羅馬教廷反對中國教徒尊孔祭祖，曾引起長達百年之久的「禮儀之爭」，清政府為維護國家主權實行了「禁教」政策，直到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在西方列強的槍炮威逼下，才被迫取消該禁令。在梵蒂岡即將封聖的一百二十人中，十七人是在「禁教」期間因違反禁令被清政府處死的。鴉片戰爭以後，教案比比皆是。自一八五六年西林教案起至一八九九年肥城教案時

止，林林總總大小教案一千五百餘起，最終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稍對這段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發生教案的主要原因正是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對華侵略所致。此次列為聖品的人中，有十五人是鴉片戰爭後至一九零零年前一些教案中被殺的，有八十六人死於義和團運動期間。

《天主教工作學習參考資料》（第一冊）頁二十七的分題為「我國政府在中梵關係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內容如下：

我國政府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建立和發展了外交關係，中國政府也願意在此基礎上同梵蒂岡建立和發展雙邊關係。但我們不是沒有原則，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也絕不會吞下損害自己利益的苦果。任何期望損害中國利益、破壞中國主權的想法都只能是痴心妄想。在處理中梵關係問題上，我國政府多次表明了兩項基本原則：（一）梵蒂岡必須斷絕同台灣的所謂外交關係，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二)梵蒂岡不得干涉我國內政，包括不干涉我國的宗教事務。我國與任何一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之前，都要就雙方之間的重大歷史問題進行檢討並達成共識，才可能建立起互信的關係。我們希望梵蒂岡對中梵關係歷史上的問題端正認識，負起責任來，並願意在此基礎上本著朝前看的態度，在堅持兩項原則的基礎上改善中梵關係。但梵蒂岡全然不顧中方的誠意，精心策劃所謂「封聖」活動，這與日本右翼勢力參拜靖國神社和歐洲一些國家出現的納粹勢力抬頭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都是粉飾侵略，篡改歷史的丑惡行徑。我們希望梵蒂岡方面不要只在口頭上表現出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願望，而要拿出實際行動來，正視歷史，面對現實，多做一些有利於改善兩國關係的事情，不要再繼續破壞兩國關係。在解決中梵關係的問題上，我們對梵蒂岡無所求。如果梵蒂岡方面不改弦更張，一意孤行，繼續混淆是非，歪曲歷史，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絕不會置若

罔聞，必將給其以迎頭痛擊。

《天主教工作學習參考資料》(第一冊)頁二十九的分題為「中國天主教界對梵蒂岡『封聖』活動的應有態度」，內容如下：

今年是新的千年，是中國人民反抗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一百周年，也是我們天主教界反帝愛國運動五十周年。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時期，梵蒂岡企圖利用「封聖」來歪曲和篡改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艱苦鬥爭的百年奮鬥史。這是我們全中國人民和愛國愛教的廣大天主教神長教友決不能答應的。我們天主教界經常講「愛國是天主的誠命」，一個好教徒，必須首先是一個愛國愛教的好公民。作為天主教徒，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可以遵守，而這種歪曲篡改的歷史、美化侵略行為的羅馬教廷當局的錯誤決定顯然不是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天主教界應當同全國人民一道堅持抵制梵蒂岡的這場政治陰謀，自覺地維護國家主權、維護民族尊嚴。

此次「封聖」活動已經在我天主教內部引起

了一定的反響。據悉，有的地方天主教會擬出版《中華殉道聖人生平》一書；有的地方天主教刊物，接連刊登「中華真福系列」和《中華殉道聖人錄》，介紹「中華真福」的生平和事跡。有的地方還流傳本省內「殉道先烈人員」名單，內容包括姓名、聖名、籍貫、年齡、殉道地點，我們已採取措施予以制止。天主教界要從維護國家利益和維護民族尊嚴出發，揭露梵蒂岡「封聖」活動的險惡用心，站在我國政府的嚴正立場上，堅持抵制這次「封聖」活動。

## 中國史學界近年對傳教士的評價

對於傳教士的種種看法，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顧裕祿教授在其所撰的「上海天主教史」（收錄於阮仁澤、高振農合編的《上海宗教史》一書，編為第十四至十八章）中的一段話，算是相當持平的說法。顧教授這樣寫道：

每一種有廣大社會影響的宗教，總有著它自

己所標榜並有信徒加以實踐的、能獲得人心的「勸善戒惡」的言行。天主教是以「愛」來標榜的宗教。在歐洲天主教歷史上，有人舉辦諸如收養孤兒孤老，救濟窮人，看顧病人等慈善事業，這是事實，不必否定。當然，宗教離不開政治，也常為統治階級所利用，這也是事實。我國近代史上，西方列強曾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國；有的傳教士不惜為侵略者效勞。但就來到我國的多數傳教士來說，他們從小生活在教徒佔大多數的西方社會中，他們所受的教育是教會學校的教育。他們選擇做神父、修女的道路，一般是出於宗教虔誠，立志為宗教而獻身。他們來中國有外國侵略中國的背景，但他們中有些人的主觀動機確是為了宗教。這些主觀動機是為了宗教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後，把舉辦慈善事業作為對天主教所主張的「愛」的一種實踐，並作為傳佈天主教和發展教徒的一項重要方法，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我們應該尊重歷史，承認這些。來到上海的不少耶穌會傳教士和仁愛會、拯亡會等女修會的修

女，為舉辦慈善事業是付出了真誠的努力的。（顧裕祿 1992·728）

另一位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顧長聲教授，在一九八零年出版了《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按當時的環境，無可避免地對傳教士的工作持一面倒的否定態度。到了一九九五年該書第三版中，新增了第十六章「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及第十七章「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當中第十七章的結尾部份，頗能反映顧長聲先生對傳教士看法的轉變，茲摘錄如下：

傳教士向中國介紹西方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他們遇到很大的阻力，中西方文化在相遇後發生了長時間的衝突。關於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已有不少中外學者發表過意見。歸根結底，從中國一方來說，主要是受長期維護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儒家思想及其政治體制所制約，加以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入侵使國勢日弱，出於民族危機感而不加區別地採取抵制和排斥；從傳教士一方來說，主要是受

基督教必欲戰勝異教中國的宗教信仰所驅使，挾持著西方科學和技術的優勢，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改造中國。

但是，文化交流畢竟對雙方都是有益的。傳教士向中國介紹西方的文化對中國是一個提高；西方吸收中國的文化則也是一個提高。在交流的過程中有衝突，甚至嚴重的衝突，但在二十世紀上期開始出現融合。文化交流說到底只能是相互滲透，決不會由一方取代另一方，彼此可能有消長升沉，但決不會同歸於烏有，而是會出現「生態平衡」的，但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傳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橋樑作用和貢獻是應當予以肯定的。（顧長聲 1995·459-460）

從兩位顧教授對傳教士的評價，可以反映出宗教事務幹部體系有意推翻中國史學界近年對宗教史及傳教士歷史的客觀評論，重新採用八十年代初期的左傾觀點。這種趨勢，應為關心中國宗教前景的人士所密切關注。 □